

中国史学史

第二册

杜维运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国史学史

第二册

杜维运 著

商务印书馆

2010·北京

中国史学史

第二册

目 录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的衰乱与史学的极盛·····	289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的衰乱·····	289
第二节 史学的极盛·····	291
第三节 史学极盛的原因·····	294
(一) 社会环境的刺激与学术昌盛的相应·····	294
(二) 史学传统的赓续与社会意识凛然于历史的 尊贵与威严·····	298
(三) 以史惩戒的观念盛行·····	301
(四) 以史制君与君主的提倡·····	303
(五) 感岁月忽忽,寄望不朽于将来·····	308
1. 感岁月忽忽·····	308
2. 寄望不朽于将来·····	309
第四节 结语·····	310
第九章 史学方法的创新与史学范围的扩大·····	320
第一节 史学方法的创新·····	320
第二节 史学范围的扩大·····	326
(一) 起居注与实录的修撰·····	327
(二) 典章制度史的大量出现·····	329
(三) 撰写人物传记与族谱,蔚为风尚·····	329
(四) 方志与地理书的丛出·····	332

II 中国史学史

(五)“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一代之说, 至数十家。”	334
第三节 《文心雕龙》与史学	336
第十章 正统的史学思想出现与正史观念的形成	349
第一节 正统的史学思想出现	349
第二节 正史观念的形成与正史的丛出	352
(一)《三国志》	355
1. 铨配适宜	357
2. 考证精审	358
3. 叙事典雅	359
4. 辞多劝诫	360
5. 写史态度	362
6. 回护	363
7. 简略	365
(二)《后汉书》	368
1. 综合的能力	371
2. 书法的得实	374
3. 文章的灿烂	375
4. 议论的纵横	380
5. 思想的卓越	384
(三)《宋书》	388
(四)《南齐书》	393
(五)《魏书》	395
第十一章 盛唐史学的特色与成就	411
第一节 隋唐的盛世与史学的发展	411
第二节 唐太宗与盛唐的史学	414
第三节 盛唐史学的特色	421

(一) 承旧与创新·····	421
(二) 史馆的设立与记注制度的健全·····	423
1. 史馆的设立·····	423
2. 记注制度的健全·····	429
(三) 集体创写历史——修史的国营企业化·····	433
第四节 盛唐史学的成就·····	439
(一) 八部正史的写成·····	439
1. 《晋书》·····	439
2. 《梁书》与《陈书》·····	441
3. 《北齐书》·····	444
4. 《周书》·····	445
5. 《隋书》·····	448
6. 《南史》与《北史》·····	450
7. 结语·····	453
(二) 史学人才的济济与杰出史学家的辈出·····	453
第十二章 刘知几的史学·····	470
第一节 概说·····	470
第二节 史学史的创写·····	474
第三节 史学方法论的开辟·····	476
(一) 博识论·····	477
(二) 史料论·····	479
(三) 采撰论·····	484
(四) 叙事论·····	489
1. 实录直书·····	489
2. 彰善贬恶·····	491
3. 简要用晦·····	493
4. 从实而书·····	495
(五) 史体论·····	497

IV 中国史学史

第四节 求真史学的境界·····	501
第五节 结语·····	511
第十三章 唐代丧乱以后的史学·····	518
第一节 唐代丧乱对史学所产生的创伤·····	518
第二节 唐代丧乱对史学所产生的刺激·····	522
(一) 助长讨论史学的风气 ·····	522
(二) 致用史学出现——杜佑与《通典》·····	529
(三) 历史笔记盛产·····	534
第十四章 中国中古史学的世界地位·····	539
参考书目·····	545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的衰乱 与史学的极盛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的衰乱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衰乱的时代。自魏开国迄于隋统一中国（魏文帝黄初元年至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二二〇年至五八九年），将近四百年，中国陷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中间虽有西晋数十年的统一，而历时十六年（二九一年至三〇六年）的八王之乱，是骨肉间极为残酷的战争；晋怀帝永嘉五年（三一一年）所发生的永嘉之乱，更掀起宇宙间的腥风血雨。自此以后，五胡乱华，大祸来临，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外族，如暴风骤至。文化重心的北方，尽为胡人盘踞，晋室南渡，南北对峙的局势形成。南方的晋，百年之间，苟延残喘，委靡不振。北方的胡族，在此期间，建立了十六个以上的国家（注一），各据一方，争战不已。到北魏统一北方（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四三九年），北方由分而合。南方的晋，则为刘宋所替代（宋武帝永初元年，四二〇年）。刘宋以后，历齐、梁而至于陈，一百六十九年之间（四二〇年至五八八年），政权迭代，如蓬从风。北方统一百年（四三九年至五三四年），继亦分裂，魏分东、西，旋转为北齐、北周。当此之时，中国

历史的演变，令人目为之眩。说这是一个衰乱的时代，应是符合史实。

“汉自董卓之乱，百姓流离，谷石至五十余万，人多相食。”（注二）“白骨盈积，残骸余肉，臭秽道路。”（注三）“长安城中尽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注四）“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谿。”（注五）“寇羯饮马于长江，凶狡鸱张于万里。”（注六）“宗庙焚为灰烬，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自天地开辟，书籍所载，大乱之极，未有若兹者也。”（注七）汉末董卓之乱，已使天下丧残，白骨盈积。永嘉之乱后，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这确是天地开辟以来，空前未有的大乱。加上统治北方的胡人，极为残酷，君主肆虐于上，人人自危。如“后魏起北方，专以刑杀为政令。自猗卢为代王，即严刑峻法，诸部人多以违令得罪。凡后期者，举部戮之。或有宗室相携，悉赴死所，或问所往，曰：‘当就诛戮。’其威严如此。道武帝以秦王觚使于燕，为所害，及克中山，收害觚者傅高霸、程同等，皆夷五族，以大刃挫杀之。其讨刘卫辰，收其子弟宗党，无少长五千余人，尽戮死。末年，每朝臣至前，追其旧恶，辄杀之。其余或以颜色动变，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动乖节，或以言词失措，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死者皆陈天安殿前”（注八）。举部戮之，无少长尽戮死，颜色动变，喘息不调，行动乖节，言词失措，即疑其怀恶在心，而手自殴击之，其专以刑杀为政令如此，这真是一个大乱的时代了！

第二节 史学的极盛

魏晋南北朝虽是一个衰乱的时代，却是一个史学极盛的时代。当时上自帝王公卿，下至山林隐逸之士，多热衷于写史；驰名的史学家，如陈寿、袁宏、鱼豢、华峤、譙周、司马彪、王隐、干宝、孙盛、范晔、裴松之、臧荣绪、沈约、萧子显、裴子野、魏收、崔鸿，前后相望；写成的史书，数量之多，卷帙之富，难有另外一个时代能与之相比拟；史书的体裁，竞出新奇，有正史，有古史，有杂史，有霸史，有起居注，有旧事，有职官，有仪注，有刑法，有杂传，有地理，有谱系，有簿录（注九）。以史书之多一项而言，唐初修成的《隋书·经籍志》，著录存在于唐初的史部书，共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加上唐初已经亡佚的史书，共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这真是洋洋大观了。可是实际上绝不止于此数，仅就杂传而论，清人姚振宗就补出书目二百五十一一种之多（注一〇）。杂传如此，其他可知。如与从殷商到汉末一千八百年间所写成的史书约二百部（注一一）的情况相比较，更显出此一时期出产史书的丰盛。当时写后汉史者二十九家，写三国史者十九家，写晋史者十八家，写十六国史者三十一家，写南朝史者三十九家，写北朝史者十八家（注一二）。写断代史者风起云涌如此，无怪史书的出产，多如过江之鲫了。

上自帝王公卿，下至山林隐逸之士，多热衷于写史，是魏晋南北朝时代史学极盛的另一面貌。魏文帝曹丕以帝王之尊，崇奖著述，撰写历史，开创了前所未有的风气。他于《典论自序》云：“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

不毕览”(注一三)。其一生醉心于典籍可见。肯定“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注一四),是他最卓越的见解。所以他感慨“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注一五),而毅然“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注一六)。所著《列异传》(三卷,已佚,著录于《隋书·经籍志》),是他的历史作品。其子魏明帝撰写的《海内先贤传》(注一七),自系受其遗风的影响。(以帝王而首先写史者,是汉明帝,他曾写世祖纪,汉章帝继写显宗纪。)

闻魏文帝之风而兴起者,是梁武帝萧衍。史称梁武帝“少而笃学,能事毕究,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然烛侧光,常至戊夜。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乐礼义》,《毛诗》,《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孝经讲疏》,凡二百余卷”(注一八)。其中所称“撰《通史》六百卷”,自是他命令史学家吴均所撰写的(注一九),然此书中的赞序,则出于其亲手所写(注二〇),这已是极为难能可贵了。其第三子简文帝著《昭明太子传》五卷,《诸王传》三十卷(注二一),其第七子元帝著《孝德传》三十卷,《忠臣传》三十卷,《丹阳尹传》十卷;《注汉书》一百一十五卷(注二二),而其长子昭明太子萧统则是千古闪耀的文选学家。观简文帝云:“铺究前史,吊古伤今”(注二三),“校覆忠贤,榷扬文史”(注二四),可知其醉心历史。观昭明太子与人书云:“吾静然终日,披古为事,泛观六籍,杂玩文史,见孝友忠烈之迹,睹治乱骄奢之事,足以自慰,足以自言,人师益友,森然在目,

嘉言诚至，无俟旁求”(注二五)，可知他也在历史中过生活。帝王之家如此，千古美事，孰过于此？

帝王热衷写史，其风自播及全国上下。以文章艳丽享盛誉的曹植，也有写史的念头。他与友人书云：“吾虽薄德，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岂以今日之论乎？”(注二六)不能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则采庶官之实录，以成一家之言，位为蕃侯之人能如此，可以说明这一个时代的人写史意识的浓厚。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以“游山泽，观鱼鸟”(注二七)为乐，以“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注二八)为志愿，但是他也写了三卷圣贤高士传赞，以叙圣贤之风(注二九)。最为恬淡的陶潜，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注三〇)，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注三一)，如此生活，《隋书·经籍志》上著录了他的十卷《搜神后记》；他于存留至今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一文中则云：“谨按采行事，撰为此传，惧或乖谬，有亏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战战兢兢，若履深薄云尔”(注三二)，其写史态度的谨慎，又尽现于字里行间了。被列入文学传的崔慰祖，著《海岱志》，起齐太公，迄西晋人物，为四十卷，写成一半，临终时与其从弟纬书云：“常欲更注迁、固二史，采《史》、《汉》所漏二百余事，在厨簏，可检写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写数本付护军诸从事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刘洋、裴揆，令后世知吾微有素业也”(注三三)。书未写成，嘱亲人续写，并寄望后世知其素业，其寄情写史之深，千百年后，犹可想见。

不是以史学驰名的人物，其写史的热忱与志愿如此，毕生以写史为矢志的史学家，其醉心的程度，不言可喻。写《宋书》的沈约于《郊居赋》云：“伤余情之颓暮，罹忧患其相溢，非异轸而同归，权殊方而并失，时复托情鱼鸟，归闲蓬荜，旁阙吴娃，前无赵瑟，以斯终老，于焉消日。惟以天地之恩不报，书事之官靡述，徒重于高门之地，不载于良史之笔，长太息其何言，羞愧心之非一”（注三四），不写历史，长太息以外，又羞愧无穷，史学家的心态，真非笔墨所能形容了！

史学范围的扩大，各种史学体裁的出现，以及驰名史学家所写史书的卓越不群，尤尽现此一时期史学的极盛，其详留待另立新章阐述。

第三节 史学极盛的原因

衰乱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为什么史学极盛呢？这是有待深究的大问题。以世变与忧患来解释（注三五），是不能完全令人满意的。历史的发展，有其弹性及其复杂性，唯一的决定历史的因素，实难存在，多种的因素，是存在的。“历史原动力复杂，千头万绪”（注三六）；“因果关系就像流通的钞票一样，纷纭庞杂”（注三七）。西方史学家的论见，值得深省。下面尝试从各方面来探讨。

（一）社会环境的刺激与学术昌盛的相应

史学的发展，有内在成长的因素，也受外来的刺激。当社会环境变动的时候，史学往往随之而趋新，而演进。“世变愈急，则

史学变得愈快,世变愈大,则史学变得愈新。”(注三八)“史学随忧患而来,忧患时代,是史学的黄金时代。”(注三九)以世变与忧患解释此一时代史学的极盛,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大凡在社会环境变幻不测之时,人心受刺激,敏感的史学家,于是研究的兴趣激起(注四〇),而簇新的史学借之出现。写族谱的风气盛行,与世族阶级的形成,息息相关;名士的清节,人物的言行,左右社会,传记的体裁,自然翻新;南北对峙,政权迭代,正统的史学思想,不期然如雨后春笋般萌芽。凡此,都说明此一时代史学之盛,深受社会环境变动的影响。“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守常,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注四一)《隋书》上的这一段话,透露了其中消息。

不过,社会环境的变动,须有限度。如果长时期“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史学是怎么也发展不起来的。安定富裕的江南,经过侯景之乱以后,“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长此下去,江南又怎能出现辉煌的史学呢?史学有其富贵性,其成绩呈现,需要一批很有学养的人,在比较安定繁荣的环境下,潜心从事。同时,其他学术的簇拥衬托,极为重要。在衰乱的魏晋南北朝四百年中,安定繁荣的时间,仍超过极乱的时间。大风暴往往数年或十数年就过去了,接下来的是升平景象。以江南来讲,五胡乱华以后,潮涌到江南的,世族以外,包括世族的戚谊、宾客、奴仆、耕农及其邻里乡党,也有农村自行组合的避难人群,这是集体的大播迁。他们在江南安居后,将比较进步的生产技术及工艺技能投入新天地,于是农、工、商业发达,一片繁荣。位居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建康,人口超过了一

百万,珍品奇宝荟萃,世胄豪门的深宅大院,莫不雕梁画栋,童仆成群。这是极度升平的景象(注四二)。到南北朝时代,江南继续繁荣。梁代的世族,穿着宽衣大带,头戴大冠,脚穿高跟鞋,香料熏衣,剃面抹粉涂胭脂;出则乘车,入则扶持。后人以“六朝金粉”来形容这一个时代,是没有什么夸大的。宋书曾盛称江南云:“江南之为国盛矣。……自义熙十一年司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踰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注四三)这是叙述自东晋初年至刘宋大明末年约一百六十五年间(东晋元帝建武元年至刘宋孝武帝大明八年,三一七年至四六四年)江南富庶、太平的盛况。隋书则称江南的宣城、毗陵、吴郡、余杭、东阳诸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故风俗澄清。”又称南郡、襄阳郡,自晋室南渡后,“皆为重镇,四方凑会,故益多衣冠之绪,稍尚礼义经籍焉”(注四四)。通典记载扬州则云:“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注四五)五胡乱华后,江南的开发、富庶、繁荣,为所有学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最好的社会环境。“稍尚礼义经籍”,“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文献所述,近于实况。所以一直到唐中叶《通典》作

者杜佑的时代),在江南的扬州,“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这是空前的盛况。江南如此,为胡族所占据的北方,也非一直混乱。北魏统一后,北方厮杀动乱的时代,已经过去,复苏的局面,使学术臻于昌盛。

魏晋南北朝时代昌盛的学术,以玄学、佛学、文学数者最显著,而数者皆与史学相应。

历经两汉数百年而极盛的经学,到东汉末年趋于衰微,继起者是玄学。玄学为玄远之学、谈辩之学。整个魏晋南北朝时代,盛行这种学术。一般学者摆脱礼法的束缚,海阔天空地谈辩老、庄、《周易》中的玄理。东晋以后,佛学也渗入其中,不少僧侣借谈辩与士流相周旋。在谈辩的时候,有如弈棋,一方面互相辩论,一方面互相称美。如称美对方“如悬河之水,注而不竭”,“宛转关生,无所不入”(注四六),是极常见的例子。如此自然能视百家的异论为“异唱”,而立言皆如天籁的流行,辩论所以见此心如“明镜不疲于应照,清流不惮于惠风”。于是人与人思想相通,精神相通,而一个开明的时代来临。一些玄学家往往奋笔写史,如皇甫谧、束皙、郭璞之流,是玄学家,也是史学家。“既文,既博,亦玄,亦史”(注四七),是当时的普遍现象。一些佛学家也写历史,像释宝唱撰《名僧传》,释慧皎撰《高僧传》,释法进撰《江东名德传》(注四八),都是显例。玄学与佛学的思想,遂直接或间接渗入史学之中,而史学为之一变,而史学益趋活泼。其时蓬勃发展的文学,尤带动史学。“学综文史”者,可领著作之官(注四九)。“文史”并称,成为时尚(注五〇)。文学家兼为史学家者比比。“宋、齐之世,下逮梁初,灵运高致之奇,延年错综之美,谢玄晖之藻丽,沈休文之富溢,辉焕斌蔚,辞义可观。”(注五一)宋、齐至梁

初文章被盛称的谢灵运、颜延之(延年)、谢朓(玄晖)、沈约(休文)四人中,谢灵运曾撰晋书(注五二),沈约是《宋书》的作者。大抵此时倜傥不群之人,多“以洪笔为钁朱,以纸札为良田”,“以义理为丰年”,“著文章为锦绣”(注五三),史学遂被簇拥衬托得光彩灿烂。

(二) 史学传统的赓续与社会意识凛然于历史的尊贵与威严

数千年来,中国朝代的更替,令人目眩。或数百年,或数十年,或忽忽数年,朝代即转换。风景不殊,河山依然,而号令天下者则易人。其间朝纲民政,或因循,或新创;人事的措施,立国的规模,则务去其旧而求翻新。历史的所以多变,祸乱的所以无穷,悉由于此。

中国朝代的更替,对史学则不发生严重影响。一朝一姓亡,史学则不随之而亡。中国史学自出现以至近代,两千余年,未尝一日中绝(西方史学有中绝的现象)(注五四)。其发展,有似洪潮,不可遏止;其活力,如万觚泉,不择地涌出。《春秋》所开创的史学,其传统至两汉而光大;《史记》、《汉书》所开创的史学,其传统至魏晋南北朝而衍为风尚。《春秋》大一统之义及惩恶劝善的史学,为司马迁、班固、荀悦所继承;《史记》的纪传体例,《汉书》的断代史体裁,到魏晋南北朝而汇为巨流。我民族史学演进的大脉络、大关键,自此等处清楚呈现。

“三国鼎峙,魏氏及吴,并有史官。晋时,巴西陈寿删集三国之事,唯魏帝为纪,其功臣及吴、蜀之主,并皆为传,仍各依其国,部类相从,谓之三国志。寿卒后,梁州大中正范

颖表奏其事，帝诏河南尹、洛阳令，就寿家写之。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注五五）

“自史官放绝，作者相承，皆以班、马为准。”（注五六）

《隋书·经籍志》上的两段话，充分说明魏晋南北朝时代风起云涌的史学家，纷纷模仿《史记》、《汉书》以写史的盛况；“《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尤见《史记》、《汉书》受到重视的程度。当时社会上流行读《史记》、《汉书》的风气，自现存的载籍中，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注五七）。历史上的朝代过去了，史学的赓续发展有如此。

社会意识凛然于历史的尊贵与威严，是魏晋南北朝时代史学发展至极盛的另一潜在因素，其隐微处鲜为人知。“刑政如此，其如史笔何？”（注五八）“陛下虽欲私臣，当如直史何？”（注五九）“国乱不能医，君危不能济，各逊遁以求免，吾惧董狐执简而至矣。”（注六〇）刑政不善，史笔必书；天子私臣，直史不容；尸位素餐的人物，难逃史官的笔锋，历史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如此。“守铁石之深衷，历松筠之雅操，见贞心于岁暮，标劲节于严风，赴鼎镬其如归，履危亡而不顾，书名竹帛，画象丹青，前史以为美谈，后来抑其徽烈。”（注六一）“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于淫僻之俗，虽衣文衣，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辇，不入彤管之书，不沾青史之笔，将草木以俱落，与麋鹿而同死。”（注六二）历史的尊贵又如此。以致“名书史籍”，是“君子之上务”（注六三）。以“国史为重”（注六四），是当时人的普遍观念。诸葛亮治蜀，“科教严明”，“道不拾遗”，“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注六五），然以不以史官